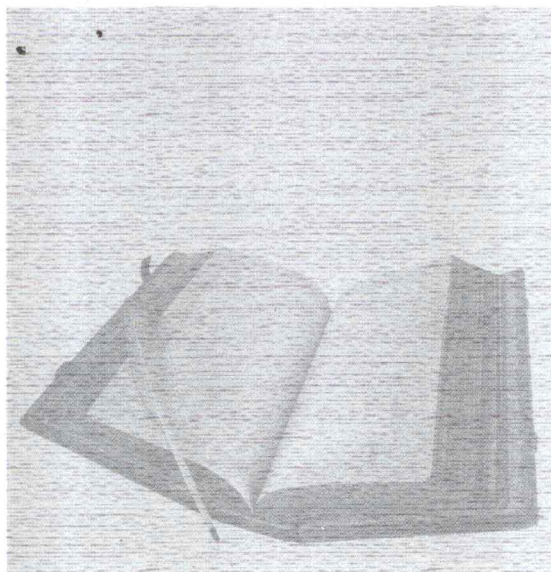




俄国哲学史

瓦·瓦·津科夫斯基 著
张 冰 译

上卷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序

在这本我写作了数年的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认为有必要为它写一个简短的序。

写作一本俄国哲学史这是我的夙愿。从 1910 年起，我就开始为写作此书收集资料，并且即使在寓居国外时也未中断这一工作。而在这方面，俄国文学史讲义对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我曾为神学院高年级班讲授过几轮。正是因为有这个讲义，我才有可能对我作为研究工作之结果而形成的主要观点进行多次检验。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重新仔细校订了所有的引文和出处——仅以我力所能及为限——作为这一既琐细又繁难的工作的一个结果，我对俄国哲学思想发展史所持的基本观点变得更加坚定。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不光叙述和分析俄国哲学家的体系，而且还把这些体系与俄国生活的一般条件联系起来。然而，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尤其是哲学思想史家——却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尽管俄国哲学与西欧思想有着无可置疑的联系甚至取决于后者，但在俄国哲学中也不乏一些独立体系，它们不光与理念的逻辑相关联，而且也与俄国生活的需求和条件密切相关。我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揭示俄国哲学发展进程的这一内在统一性和辩证关系，也便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在这部书中以最大限度的客观性呈现这一进程。

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所有为我提供资料的人——在这方面我尤其得益于下述人员的帮助，他们是 Л. А. 赞德、В. Л. 亚切诺夫斯基、

A. П. 斯特鲁威、B. 季莫费耶夫神父和 B. Л. 伊万诺夫——表达我真摯的谢忱。

我还要向决定出版我这部书稿的青年基督教运动出版社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大司祭瓦·津科夫斯基
1948 年 6 月 21 日于巴黎

瓦·瓦·津科夫斯基：为俄罗斯与东正教服务之路

俄国哲学家、神学家、教授、东正教大司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津科夫斯基（1881—1962）之所以在读书界享有盛名，首先是因为他所著著名两卷本《俄国哲学史》，而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该书的一个新版。这一基础性研究著作就其所涉及人物的广泛性和所分析哲学观的深刻性而言，迄今仍然是一部不可替代的教学辅助读物。这部著作最可宝贵的优点，既取决于俄国哲学本身的天才魅力，也取决于作者本人的多方面的才华和禀赋。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津科夫斯基将自己的大半生时间都献给了教学和科研工作，而多达数百部业已出版的著作就是其结果。但他又最不适合被称之为书斋型学者。对于要求离群索居孤独自处的哲学思辨的癖好以及最大限度地把精神凝聚在某一个思考对象身上的能力，与常常促使他同时干几件事和同时照顾许多方面问题的干练的天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哪怕只是简要回顾一下瓦·瓦·津科夫斯基的生平，也会使我们惊讶不已。

瓦西里·津科夫斯基 1881 年 7 月 4（16）日生于乌克兰的普罗斯库罗夫（现为赫梅利尼茨基）。作为神父的孙子和中学教师和教堂长老的儿子，他是在正统东正教精神和俄语文化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他先是在基辅古典中学完成中学教育，中学毕业后成为一个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信仰坚定的无神论者。1900 年考入圣弗拉基米尔皇家大学物理数学系的自然科学专业。

瓦西里·津科夫斯基属于我们所说的为俄罗斯的宗教复兴担负责任的那一代人。少年时代他的精神经验的内容是摒除宗教取向，成年后又开始向教会内部自觉的宗教生活回归，这是绝大多数他那一代代表人物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如谢·布尔加科夫、尼·别尔嘉耶夫、亚·卡尔塔舍夫等人）。1902年他一边独立研究教会中东方教父的本土著作和俄国文学作品，一边又受到格·伊·切尔帕诺夫教授所开心理学和德国哲学课的影响，这使他重新获得了信仰，重新为自己发现教会的人生经验。与此同时，他对自然科学主题的兴趣开始减弱，并且促使他在1904年作出决定，转到历史语言学系，以便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心理学问题上来。除此之外，这样做也得以使天性干练的他够在社会服务领域发挥其才干。瓦西里·津科夫斯基发表了众多论著，并从事了大量的组织工作。1905年，他和谢尔盖·布尔加科夫一同创办期刊《民众》，当然该刊很快就被审查机关取缔。也是从1905年起，他开始积极参与基辅宗教与哲学研究学会的工作，并在1910年成为该学会的主席。

1909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被留在系里作为从事教学工作的储备力量。1913年他被派往国外留学以写作其硕士学位论文。但随即开始的世界大战，使得这次国外留学猝然中断。津科夫斯基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俄国，并开始在基辅大学讲授心理学和逻辑学课程。1915年他在莫斯科的格·伊·切尔帕诺夫教授的指导下，出色地通过了以《心理学因果律问题》为题的硕士论文答辩，并被遴选为基辅大学哲学教研室客座教授。

瓦·费·阿斯穆斯在其回忆录里描绘了这位受到学生爱戴的教师的鲜明形象：“从第一节课起津科夫斯基就给我们留下了令人震惊的印象。对于其宗教倾向性和哲学理念的唯心主义内涵，他从不隐瞒。而且他甚至还是这些理念的激情洋溢的宣传者。……。他讲课非常投入，有的时候甚至逸兴遄飞。他在心理学领域有着非常精深的造诣。……。他讲课的特点在于善于把心理学当哲学讲授。他对

心理学理论和术语的辨析，常常能使之达到哲学原理、哲学基础和哲学本源的地步。他善于广泛地、大量地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利用哲学材料，并用哲学观点来阐述心理学学说……”^①

1917年革命后，津科夫斯基教授不得不终止其学术工作，并且，尽管他极其厌恶政治活动，也不得不在1918年接受提议，担任盖特曼帕·帕·斯科罗拔德基^②政府的宗教信仰部部长职务。他在政治领域里为了有利于俄罗斯安定乌克兰而忘我工作，并与乌克兰分离主义和仇俄现象做斗争，这使得他在斯科罗拔德基政府垮台后，已经不再可能继续在苏维埃俄国生活。他一生漂泊漫游的漫长时期从此开始。

1919年瓦·瓦·津科夫斯基移居南斯拉夫。从1920年到1923年间，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讲授哲学。津科夫斯基历史观中最重要的内容即形成于这些年间。在一篇名为《正教文化的理念》（柏林，1923）的短文中，这位俄国哲学家对其以后全部工作的基础性命题和主要宗旨，均做了阐述。对于今天如此重大而又迫切的欧洲危机问题，以及俄罗斯如何在世界文化中获得地位的问题，在瓦·瓦·津科夫斯基笔下，得到了概念性的解决：“我们的确彻底吸收了西方文化，但我们又并非仅靠西方文化为生；俄国天才的特点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成功地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以至于犹豫不决的西方会把充满希望的目光恰好转向我们而非其他地方。我们就其文化而言是欧洲人，但又不光是欧洲人；我们身上还有某种独有的特质，对此不光西方不理解，而且或许连我们自己也未必理解。我们所以能吸引西方的，也恰好正是我们身上的这一特质，这一特质使我们有可能不光把西方的悲剧深刻地体验为自己本身的悲剧，而且还使我们有可能力量自由而又独立地解决西方问题。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

① 瓦·费·阿斯穆斯：《基辅大学1914—1920年间的哲学》，《哲学问题》，1990，第8期，第91、92页。

② 1918年德帝国主义占领乌克兰时扶持的傀儡。——译注

尚不为西方所知的支点，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西方仅只偶尔和秘密地给予的营养源。俄国文化正在日甚一日地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世界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型文化。”并不背对西方，也不回避世俗文化，而是直接走入文化之中使文化教会化，使世界文化正教化，而首先是使业已世俗化了的西方文化正教化，这就是俄国和正教的使命。津科夫斯基把西方文化的危机当作西方基督教的危机，对西方因而也就是对我们而言——因为我们和西方是一体的——摆脱危机的出路或许只能在宗教层面，亦即只能在正教的栖身之所里才能找到。”^①

瓦·瓦·津科夫斯基对俄罗斯思想的进一步思考，是在其针对俄罗斯—塞尔维亚听众的讲座中实现的，该讲座的题目是《俄国思想家对欧洲文化的批判》。这些演讲最先采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以《俄国思想家与欧洲》（扎格勒布，1922年）为题出版，1926年，又被修订为概述，用俄语在巴黎出版。

1923年津科夫斯基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担任在那里的布拉格高等师范学院实验心理学与儿童心理学教研室主任。从1923年到1927年，他担任俄罗斯国外中学教学管理委员会主任。1923年起他担任俄罗斯大学生基督教运动的常任主席。他仍然继续发表其有关教学法、心理学与神学研究的论文，但他的主要兴趣仍然在哲学领域。

1925年4月30日，东正教圣谢尔盖神学院在巴黎正式揭牌，瓦西里·津科夫斯基嗣后的全部工作，都与这一学院紧密相连。1925年秋季，瓦·瓦·津科夫斯基同时承担该神学院和布拉格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直到1926年，才彻底移居法兰西。在法国巴黎，除在圣谢尔盖神学院的教学和教研室的行政管理工作外，他那干练的天性使他总是能为自己找到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的操心事。1926年，

^① 《正教文化的理念》，《基要》，1997，第14期，第327页。

他开办了高等妇女神学讲习班，组建了宗教教学办公室。1927年，他担任《宗教教化和教育问题》杂志编辑。而从1927年到1961年期间，他编辑《宗教教学通讯》杂志，从而得以与尼古拉·别尔嘉耶夫首创的某些事业联合。而他在哲学和神学研究领域里的研究工作和文学创作，则远比这更加成果卓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意外地被法国政府逮捕。蹲监狱的经历，促使瓦西里·津科夫斯基作出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背起牧师角色这副重担。1942年在巴黎解放和回返巴黎后，由都主教耶夫洛吉耶为他做了晋升为神父教职的按手礼。在他的所有功绩中，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教会服务的忠诚的、正直的好神父。

1944年神学院院长谢尔盖·布尔加科夫逝世后，瓦西里·津科夫斯基神父被遴选担任这一空缺的职位。

1946年，津科夫斯基开始撰写其关于俄国哲学史的煌煌巨著，经过两年聚精会神而又令人精神疲倦旷日持久的劳动，出版了该书的上卷，然后又过了两年，出版了名著《俄国哲学史》的下卷。该书作者的文学才华和哲学禀赋使得这样一部论著，成为一部高水平的哲学史研究专著，同时又是叙事通俗易懂的教学参考书，它既包括了广泛的和大量的经验素材，同时又不失大胆无畏的理论概括，而我国当代哲学思想界，则在理论概括方面最为贫乏，也最为薄弱。

瓦·瓦·津科夫斯基所推出的历史学理念，既在俄国思想史上诸多个别问题的研究中，也在一些具有广泛概括性的理论研究论著中，进一步获得观念化的形式^①。

1962年8月5日，经过病魔的长期折磨，瓦西里·津科夫斯基

^① 参见《我们的时代》，1952；《论俄国思想史上乌托邦主义的特点》，1955；《论俄国科学界和哲学界虚拟的唯物主义问题》，1956；《论果戈理》，1961；《为基督教教义辩护》，1961；《基督教哲学原理》，1961—1964，第1—2卷。

溘然长逝，他被安葬在巴黎的德·布阿圣日内瓦公墓。

阿·瓦·特鲁汉

谨将此书献给

我的朋友兼同事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芙娜·切特韦里科娃

导 论

1. 本书的宗旨是向读者介绍以其史料的完整全面，以其内在的辩证关联和历史的编年顺序见长的俄国哲学史。我国文学中有不少关于个别俄国思想家甚或俄罗斯思想的整个流派的著作，但却迄今没有一本用俄语写作的俄国哲学通史。本书理应填补这一空白，并为俄罗斯思想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指导。

2. 在俄国，哲学领域里的独立创造——确切地说，是独立创造的最初萌芽——我们只在 18 世纪下半叶才有所发现，而在 19 世纪，才开始了一个决定了哲学在俄国的发展道路的哲学思潮高度紧张、日趋激烈的时代。

但是，如果以为在 18 世纪下半叶以前，俄罗斯人的心智都与哲学的需求无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对哲学的需求出现得足够频繁，除非常罕见的偶然和例外，对哲学的需求往往会在宗教世界观中获得满足。在这方面，18 世纪以前的俄国宗教文化就其风格而言与以宗教定势为主要趋向的中世纪的西欧十分相近。要知道哲学史上一个共同的事实是（在印度、希腊以及中世纪的欧洲都曾是这样）作为独立而自由的精神创造的一种形式的哲学，是从宗教世界观的内核中诞生出来的。宗教意识如能使所有的精神力量都富于创造力，则其必然而又确定无疑会产生哲学的创造——而且我们根本不必认为哲学思考无论何时也无论何处都起源于怀疑，哲学思维在更多情况下是靠最初的直觉推动的，而直觉尽管它的根深深

地扎在宗教世界观里，但却带有其自身的母题和灵感。但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思维只有在研究自由——而且内心自由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外部的自由——的条件下才能生长。

在西欧，哲学创造除了这两个来源以外，还有一个其从古代世界继承而来的恢弘的哲学遗产。西方当然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乃是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血肉关联的古代哲学遗产的继承者——尤其是因为拉丁语原本就是一种教会的语言。这使得早期中世纪人就已经能够掌握一种现成的哲学术语体系（尽管从另一方面说，这一术语体系也常常是导致哲学迷误的根源）。

而我们发现俄国走过的道路与西方截然不同：当哲学思维开始在俄国苏醒之际，那时的俄国人发现他们西方的邻居们正过着紧张激烈而又热情奔放的哲学生活。这种生活不仅以其丰厚的过去，而且也以其鲜活的当代哲学如此丰富如此充满力量地耸立在俄罗斯人的大脑前，它不光激发起了俄罗斯人对哲学的兴趣，而且也压迫和挤压着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必须花费大量的劳动，才能在自己身上把必要的学徒身份与其自身的自由创造融为一体。

因此在俄国哲学史上将哲学创造的上述三种因素结合起来的途径与西方截然不同。一方面，俄罗斯思想从始至终（永永远远地）与其宗教自发势力，与其宗教土壤相关联，俄罗斯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根本特点以及各种复杂化进程的主要根源，端赖于此。另一方面，俄罗斯人的大脑又永远珍重自由的灵感，在俄国，几乎永远不是教会，而是国家在扮演禁锢的审查机关的领路人角色——而如果在教会内部产生了自己的限制性倾向，而且，由于来自国家的压力，而使这一倾向达到很大力度的话，那么，自由的精神在教会意识的核心永远都是不会熄灭的。哲学创造所需要的这两种因素（宗教世界观与理性的自由）在俄国一直都存在，而当俄国战胜了鞑靼人的统治，随后（在17世纪初）又在所谓的“混乱时代”，俄国终于开始走上了独立发挥文化作用的道路。但第三种因素，即丰富而又具

有创造性的哲学生活在西方的存在，既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意义。一方面，对西方哲学文化的了解，使得俄罗斯人似乎缩短了自己攀登哲学思维之高峰的路程，使其迅速进入自己那个时代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核心。在这方面一个足以令人感到惊奇的现象是，比方说，俄国学者们^①居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疾地登临自己那个时代的哲学高峰。但也应看到，俄罗斯人自身在哲学领域里的创造，与其在西方的发现相比，毕竟还是受到严重限制。整整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沦落成为西方的俘虏，开始激情洋溢而又热烈奔放地追随西方人的创造和探索之路，总之，俄国是在以鲜活的回声的方式，对西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的。俄罗斯人以自己天才的力量最先是在文学领域初露锋芒的：在对西方的数十年模仿以后，先是杰尔查文，然后是茹科夫斯基的时代，直到普希金的出现，在他身上，俄罗斯人的创造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未离异于西方，而是对西方的生活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与此同时却又在自由和灵感中，将自身与俄罗斯精神最深的深处以及俄罗斯的“自发势力”结合了起来。继文学之后又出现了其他艺术形式（戏剧、绘画、后来还有音乐），而且哲学在俄国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同样也并不与西方格格不入，甚至经常而又勤奋地向西方学习，但仍然还是以自己的灵感和自己本身的问题为生。19世纪为俄罗斯人插上了哲学的翅膀，俄国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哲学思维之路。

3. 在此，我们必须对一种误会稍做解释，因为我们不止一次发现新近的哲学史家有这种误解，这对于俄国的哲学研究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后果。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关于认识的学说（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乃是哲学最必要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康德之后的哲学史上变得尤为牢固，所以，一种思想不止一次得到了表述，即哪里没有认识论，那里就没有哲学。

① 如18世纪中叶的罗蒙诺索夫，19世纪前30年中的洛巴切夫斯基及许多其他人。

当然，如今任何人都不会断然否认认识论对于哲学所具有的头等重要意义——而且，的确，在西方，整个新式哲学都是在认识论的标志下进行的。然而，我们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赋予认识论以判别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进入哲学领域的决定性作用。这里我们只需提及西方近代哲学史门坎上的两位天才人物——乔·布鲁诺^①和雅·伯麦，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仅以认识论的有无是不足以确证思维的哲学品格的。有时候形而上学被推出以取代认识论作为哲学最必然和最必要的一部分——但也依然还是无法赋予其以这样一种决定性意义。哲学不是只有一个根，而是有几条根，哲学的全部特点端在于此。哪里有在精神生活理性化的道路上对其统一性的探索，那里就有哲学的各种形式的经验（不光感性经验、外在经验、心理经验、社会经验，还有非感性经验，如伦理经验、审美经验和宗教经验）为我们的思维提出了诸多问题，要求采用理性的方式对其予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直觉洞察力方面即已初现端倪，但哲学尽管以直觉为营养源并靠直觉来推动，却只有在理性力量也被使用来揭示直觉的地方才会出现。哲学不可能成为一种职业（профестический）；这是对术语的滥用；职业化写作可能对哲学文化有重大意义，可以开辟新时代，但哲学并不是在发表预言，而是在说服，它不光为听众或读者而存在——它是在为自己寻求理性形式，寻找说服力，也就是说，它在寻找能在逻各斯方面为我们呈现理由和根据的东西。经验自身尽管其无限丰富而多样，但对经验的描述还不能构成哲学，经验只能为哲学意识提出问题，而哲学创造则只能来自于哲学意识。而且，创造本身对于其自身而言本身当然就是问题——对于认识，对于认识的手段及其潜能的批判分析，就是这样伴随着逻辑必然性诞生的。

4.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哲学创造永远都趋向于体系的建

^① 乔·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泛神论哲学家和诗人。主要著作有《论原因、本原和一》、《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等。——译注

构。这也就是逻各斯层面，在这一层面里，从精神的深处所诞生的一切，从精神涌现出来的一切，不管其答案如何，“都应被纳入一种体系中，并在该体系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一（心理学）意义上，哲学创造是一元论的——然而，问题当然并不在于整个体系是否是从某一或某几个最初论点推导出来，而在于要赋予精神生活全部内涵以体系性。即使哲学创造并非总是能达到体系，但它毕竟永远都在奔向体系。

在我们着手研究俄国哲学，也就是历史地研究俄国哲学以前，做一番这样的思考于我们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俄国哲学的研究者们已经不止一次发现，俄国哲学的重大缺陷在于它对认识论问题缺乏兴趣，这一指责正如我们上文所述，是错误的，然而，即便情况真的是这样，——如某些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能否认为对认识论缺乏兴趣乃是哲学不成熟的标志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这么说绝对没有任何根据：认识论并非哲学的核心学科。我们可以把认识论故意放在哲学的中心位置，然后一切从它出发（正如西欧在最近的两百年中所做的那样），然而，审慎认真的历史研究会告诉我们，在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那里，占据其创造核心位置的，恰好正是普通的、最初的直觉——正是它们（而非认识论）决定着思维的进程和体系的逻辑。我无意以此来贬低认识论的意义，贬低认识论对于尤其是在康德之后笼罩在哲学中的批判主义精神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然而，认识论毕竟不具有正面意义，而只具有负面意义——它只能帮助我们摆脱哲学的幼稚病，防止我们把从一个哲学领域里得出的归纳概括和体系极不慎重地移用于另一个。在此我要刻意强调这一点，不是为了与认识论的信徒们展开论战，而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清醒和公正。尽管在纯先验论体系的建构上精雕细刻，但谁能否认伦理主题在费希特哲学创造的各个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呢？而忙于建构一种能够摆脱康德体系之矛盾的认识论的，不正是费希特吗！还有一例：我们能否不承认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家称号？

我们是否该把尼采称为政论家？

俄国哲学——就其 150 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如此断言——有某种独异的特点，一般说它足以把认识论推到次要位置。俄国哲学家中除一小伙正统的康德主义者外在解决认识论问题时都倾向于所谓本体论，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认识并非人身上占据首位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换句话说，认识仅被认为是我们在世上所做活动的一部分或一种功能，是生活进程中的某个事件，因此，它的意义、任务及其可能性，都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总的态度。但我们却殊无必要采用一度被詹姆斯（W. James）以如此动人的天真烂漫予以表达的原始的实用主义精神，来对此加以阐释。——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读到的那样，俄国哲学思想中的本体论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为下文将要进行的分析做预告的同时，在此，我们只想简单提示一句：俄国本体论所表达的，不是现实对认识所占有的优势地位，而是认识对于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对于我们在世界上的“活动”的参与性。

5. 我之所以会涉及俄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只是为了表明下述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意见认为俄国哲学似乎尚未成熟，因为它尚未对认识论问题进行过足够充分的研究。但是我却不愿意自己被人们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即似乎我认为本体论是俄罗斯思想所具有的突出的特点（如文学中已经不止一次被人强调指出过的那样）。如果非得给俄国哲学以一种总的描述，而且描述自身也从不覬覦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话，那我宁愿把俄国哲学探索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置于首位。俄国哲学非以理论为中心（尽管它的相当一部分代表人物本质上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也非宇宙中心论的（尽管自然哲学问题很早就开始吸引俄国哲学家们关注）——俄国哲学研究最多的是关于人的主题，关于人的命运和道路，关于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的主题，这首先表现在伦理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时时处处都占有显著优势地位（甚至在抽象问题里）：这是俄国哲学思维最有效益，最具有

创造性的来源之一。列夫·托尔斯泰以极其巨大的力量在其哲学著作中加以表达的泛伦理学主义，以其众所周知的正当性，以其众所周知的局限性，几乎可以在所有俄国思想家身上找到，甚至在那些本身没有作品，而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论述道德伦理问题的俄国思想家（如基列耶夫斯基）身上也能找到。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即与此相关，但它却更加无比鲜明地表达在对于历史理论问题的极其特殊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密切关注上。俄罗斯思想从始至终渗透着历史理论，它往往十分关注历史的意义、历史的终结这样一类问题。16 世纪的世界末日论与 19 世纪的乌托邦主义，与各种各样思想家的历史理论思考遥相呼应。对历史哲学的这样一种独异的，我们可以说是超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显然植根于和导源于俄国的过去，导源于俄罗斯灵魂的总的社会特点的精神取向。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这种情况对于纯哲学在俄国的发展并非十分有利——对历史哲学问题的关注使得思维不得不面对最复杂、最令人困惑，同时也最繁难的史料。另一方面，那种所谓主观方法（这是以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为首的整整一派俄国历史学家所引进的一个术语，可参阅本书下卷第九章关于他的论述），一言以蔽之，亦即在历史现实的分析中引入评价立场。稍有不慎，就会产生把在实用领域显得很危险有可能为社会生活中的某种有害潮流辩护的某种内在审查机制带到哲学创造中来的结果。这一内在审查机制当然会压制自由的哲学探索，产生极其危险的理论体系迎合当前大家都关注的事情的倾向。在哲学工作在俄国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从 18 世纪末哲学的萌芽到我们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倾向，但如果我们在指出哲学不应迎合现当代的同时，却并未察觉所有这一切后面更深刻的一面，那也会是极其肤浅的。在思维的人类中心主义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母题，那就是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是不可能分开的。上文提到过的那位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注意到俄语单词“правда”的特点时，极其出色地表达了这

一思想。“每次当我大脑里蹦出‘правда’这个单词时，”他这样写道。“我都不能不为这个单词难以言喻的内在之美而惊叹不已……好像只有在俄语中 истина（真理）和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正义）被用同一个单词来指称，致使二者仿佛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的整体。Правда——就此词最深广的内涵而言——永远都是我探索的目标……”俄国哲学思想最重要的灵感之一，就在于理论与实践、抽象思维与生活的不可分割性，易言之，就在于完整性的理念之中。除罕见的例外，俄国哲学家们所孜孜探索的，正是完整性，是现实所有方面以及人类精神所有活动的综合和统一。完整性这一口号在历史存在中，比在自然或抽象思维的纯概念研究中更必要，更不可取代。俄国哲学的人类中心性永远都在引导哲学去揭示我们所天赋的和给定的完整性。

6. 俄国哲学不止一次被人指责为缺乏独创性^①。“俄罗斯所曾经拥有的一切以及它所提供的哲学的东西，”我们在一位俄国哲学史研究家^②的笔下读到这样的话。“全都或是产生于直接模仿，或是产生于无意识的屈从外来的影响，或是产生于把若干种别人的思想折中主义地拼贴在一起的意向”。如果这段话真地符合实际的话，那我们当然也就无法认真地讨论什么哲学了，因而，研究俄国哲学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但在各民族文化史上，我们总是能找到那样一些作品，它们充满了模仿和外来影响，而在研究著作中人们提及此类作品的目的，仅仅是要人们不要忘了在历史的荧屏上，也有一些黑暗的篇章。

指责俄国哲学缺乏独创性的判断，如果不是为了大言欺世，那就是对俄国思想的一种有意敌视和蓄意诋毁。我并不打算反驳这一论断——我的这部著作本身完完整整地表明上述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仍然认为有必要在此，在导论这一章里，着手消除某些误解，这些误解尽管没有采用上述那段话语那么尖锐的形式，但在俄罗斯

① 这种观点最激烈的表述者是撰写了大部头俄国哲学史著作的 Б·雅科文科。

② Б·雅科文科：《俄国哲学史概论》，1922，第5页。